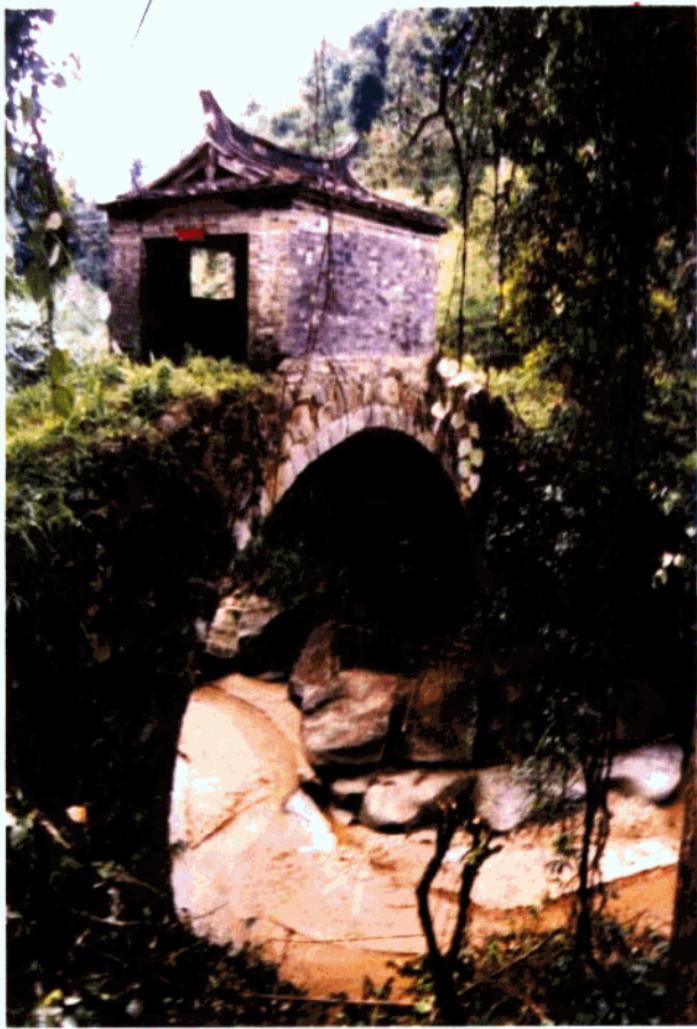


1307

南靖文史資料

第三十輯



福建省南靖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

二〇〇六年十月出版

南靖文史資料

第三十輯

福建省南靖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2006年10月

《南靖文史资料》编委会

编委主任：陈常姓

编 委：张金生 王其春 吴志金 谢新鎏

审 稿：陈常姓 吴志金 张金生 王其春

主 编：今 声

副 主 编：吴志金 王其春 唐崧

责任编辑：谢新鎏

校 对：吴芸芸 施碧娥

第七届南靖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主 任：张金生

副 主 任：王其春 谢新鎏

委 员：王华洋、肖汉良、陈智勇、曾少南
任霄盟、庄雪华、曾丽珊

主 办：福建省南靖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

编 辑：《南靖文史资料》编辑部

地 址：福建省南靖县山城镇兰陵路 12 号

电 话：0596 - 7822420

邮政编码：363600

封面题字：黄典诚

封面封底设计：张源泉

封面封底《树德桥风光》摄影：江清溪

内文图片：江清溪 等

批准证号：（漳）新出〔2006〕内书第 085 号

印 刷：漳州市恒实实业有限公司

电 话：0596 - 2090001

目 录

[往事回眸]

下放山城的日子 章 武(1)

战地春秋

——老红军姜茂生的回忆 姜 文(19)

南靖最早组建的教育基金会 张尧耕(27)

[人物春秋]

冶鼎铸炮炼丹心

——记南靖籍清代著名冶铸巨匠黄取 唐 嵩(31)

大山丰碑

——记烈士陈木树 谢新婆(37)

芳草忠魂

——记烈士李元昌 李春钟(47)

目 录

青青竹山魂

——记烈士李明康 张 潮(57)

荆山玉璞钻弥坚

——记南靖籍语言大师黄典诚

..... 张荣仁 唐 嵩(67)

台史宗师遗著多

——记南靖籍历史学家黄典诠 唐 嵩(91)

归侨张永年教授的报国志 张尧耕(97)

[文物寻踪]

漳泉古刹岱房庵 谢华章(100)

荆都村“树德桥” 吴志金 江清溪(104)

[城外掠影]

美国见闻录 崔浩达(107)

泰国印象 饶秀峰(118)

[政协纪事]

- “三下乡”还需“三贴近” 陈常姓(124)
- 第七届南靖县政协提案工作回顾 饶秀峰(127)
- 第七届南靖县政协的调研工作 施碧娥(135)
- 第七届南靖县政协委员视察工作综述
..... 施碧娥(144)
- 第七届南靖县政协“五个一”活动见实效
..... 庄木士(151)
- 第七届南靖县政协扶贫助学记 施碧娥(153)
- 实施量化考核 促进工作落实 吴志金(160)
- 第七届南靖县政协创办“老委员联谊会”纪事
..... 陈其川 苏荆华(163)
- 创办兰陵书画社和政协委员之家纪实
..... 吴志金(167)
- 南靖县政协 2005 年 8 月至 12 月纪事
..... 谢新鎏(171)
- 南靖县政协 2006 年 1 月至 6 月纪事
..... 谢新鎏(182)

下放山城的日子

章 武

赤脚记者



作者在长塔煤矿采访

1971年冬，县里发来一纸通知，把我借调到县报道组工作。所谓“借调”，顾名思义，即临时借用，并非正式调动。我想，作为一介书生，

一名“下放干部”，别无所长，惟剩手中一把笔而已，能被县里暂时借去抄抄写写，也算是一种“重新学习”吧？没想到，这一借，就长达七年之久。人生有几个七年？而在南靖山城的这七度春秋，从29岁到36岁，正是我血气方刚，风华正茂，一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岁月。

好在报道组的工作，无非是县里写点新闻方面的稿件，对我来说，倒也适得其所，因为下放前我毕竟在大学中文系教过写作课，新闻的“五个W”（即五要素）之类，

在课堂上早都讲得滚瓜烂熟，如今有了实践的机会，何乐而不为呢！况且，不久以后，县里又把我的妻子从内山正式调进南靖一中任教，全家因此在县城有了小小的两居室，外加半间厨房、两小畦菜地，前有火鸡在鸡寮中生蛋，后有丝瓜在竹篱上结果，在兵荒马乱的年头能如此安居乐业，谢天谢地，夫复何求！

那时的县报道组，由两个方面军组成。第一方面军即正规军，拥有本县三大秀才。组长王古镜长期在农村基层摸爬滚打，对县情了若指掌，他说话慢声细语，办事小心谨慎，虽然有点婆婆妈妈，但毕竟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。组员中的赖金炎，虽不善言辞，但却有个鼎鼎大名的绰号，叫“赖头条”，据说他过去所写稿件常常上报纸的头条。另一位组员卢鸿祥，农技干部出身，是我的莆田老乡。他为人心直口快，什么该写，什么不该写，我全都听他的，至于每篇文章怎么写，他则全听我的。我俩配合默契，简直到了形影不离的地步。

报道组中的第二方军，自然是我们这些被临时借调的下放干部了，尽管只能算是游击队，但都闯荡过江湖，见过世面，战斗力一点也不差。其中有位“刘大记”，即原新华社记者刘国柱，毕竟来自权威新闻机构，其敬业精神无比伦比。业内人都知道，写一篇新闻通讯，大凡掌握三个过硬的例子即可下笔，而他，偏要不厌其烦地采访到30个例子才加以仔细挑选，可谓“打破砂锅问到底，还问锅渣在哪里？”有天，我到他宿舍拜访，敲门时有人应声，推门后却不见人影，只见办公桌上蒙着一床毛毯，他好不容易才从桌子底下钻了出来。原来，报道组没有暗房，他就这样因陋就

简，用土办法冲洗胶卷呢！我戏称他是世界新闻摄影史上一大奇迹的创造者。还有一位同事，是原省电台记者吴志伟，虽然共事时间不长，但他那一口标准的北京音普通话，却让我十分羡慕。看来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只要能与电台的播音员们共事，耳濡目染，年长日久，连他这位原来满口地瓜腔的同安人，也都能吐出高贵的京腔京调来。

两个方面军尽管有很多差异，但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，彼此之间取长补短，求同存异，倒也相处得颇为融洽。如今，虽

然时过境迁，但留下的，全都是美好的记忆。可惜赖、卢二君，皆英年早逝，成为故人，不能不令人扼腕叹息！

当年，三天两头都有采访任务，全组每年见报的稿件多达一百篇左右，贴起剪样来，总是厚厚的一大本。每篇稿件，都集体署名为“南靖县报道组”，有时，也偶尔用用“南靖县鲍岛”之类的笔名。不过，用今天的眼光来看，大都是应景之作，乏善可陈。毕



“中华儿女多奇志，不爱红装爱武装。”在五斗山采访时，本文作者（后排中）与王秀花（前排右二）及军分区同志合影。

竟，谁也逃脱不了时代的局限性。时值文革后期，稿件中难免充满那个特定年代的空话、套话、废话，乃至一些连自己也未相信的假话。

然而，敝帚自珍的我，总觉得仍有少数几篇稿件，尚有一定的史料参考价值，因为它们比较真实地记录了当年基层干部群众的生存状态，不妨在此稍带一笔。比如，描述五斗山妇女耕山队艰苦创业，改造烂泥田的长篇通讯《来自五斗山的报告》，曾在福建日报以头版整版的篇幅全文刊登，在当时也曾产生过较大的反响。其队长王秀花，久经考验之后，终于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领导干部，现为漳州市政协副主席。比如，表现山城公社汤坑大队农业学大寨的长篇通讯《九龙江畔新农村》及《一年一个样，三年大变样》，先后在人民日报专版和《福建日报·农村版》头版发表，在当年，也算是“促生产”的一大典型。又比如，写金山公社春耕生产的通讯《金山春色》，是在跟随公社书记俞俊才爬山涉水一个星期之后才写成的，在当年的省报上，算是罕见的一篇多少带点散文笔调的通讯了。此外，人物通讯《志在山乡测风云》，写的是和溪公社一位女知识青年向当地农民学习气象测报的故事，因取材特殊，在人民日报发表后，还被翻译成英文，推介到国外去。

上述文章，不论好坏，每一篇都是大家深入基层，贴近群众，一步一个脚印采写出来的，千辛万苦，来之不易。不像如今的一些“无冕之王”，靠电话采访，靠会议“跑场”，靠主人提供的通稿，或光凭鼠标点击，“百度”下载，一天就能发出好几条新闻，外加收取好几个红包，又轻松又实惠。当年，我们这些类似于“赤脚医生”的“赤脚记

者”，下乡采访，说走就走，或步行，或骑车，或坐班车，全都不计较。只有在陪同上级新闻单位的记者时，县里才派专车，但也只是吉普车而已，然而，这也就是当年县里的最高待遇了，须知，连县委书记下乡也不过如此。为此，一位司机曾对我开玩笑说：“我是抬轿子的，你是吹喇叭的”。乍听此言，我心里头一格登，觉得有伤自尊，颇感委屈。但事后细想，也对，作为“御用文人”的我们，其实质与吹鼓手并无两样。

至于下乡驻点，更是家常便饭。那时没有宾馆，没有饭店，能在大队部栖身，就算不错了。记得有一次，我曾在在一个大队部的木长凳上睡了一宿，第二天一早醒来，发现身上被山蚊咬的红斑点居然有 55 点之多！行文至此，我皮肤上的痒痛之感似乎尚未消退呢！其实，在当年，就是正规记者下乡，生活上也都很随便，那怕福建日报老总林振夏率队来南靖，开夜车写稿，其点心也只是每人一碗面条而已。记得食堂老师傅把面条端到招待所楼上时，发现筷子少了一双。跟随林总的女记者林爱枝说：“不要紧，就把我这双筷子折断成两双吧！”于是，她和我每人半双筷子，照样把面条哗里哗啦吃个精光。后来，林爱枝当上福州市委宣传部部长，继而又当上省新闻出版局局长，见面时，还常常笑忆当年那一双筷子的故事呢！

至于地区通联站的战友们，则更是亲如一家，彼此之间常用样板戏《智取威虎山》中的人物绰号相称，如“三爷”庄敬忠，“许大马棒”许崇安等。最受欢迎的是陈明杰，因为他擅长讲故事，笔耕之余，充满恐怖悬念的《梅花党的故事》啊，《一双绣花鞋》啊，常让年轻的听者吓得晚上不敢

睡觉。他退休后定居澳大利亚珀斯，前不久返国时，还特地来福州看我。阔别久叙中，我俩还共同忆起当年有关记者生涯的一首打油诗。诗云：

记者苦，记者难，十天半月老下乡；有朝一日回家转，
带回两袋臭衣衫。”

后来，有人觉得这样说自己未免太晦气了，便反其意作了改动：

“记者乐，记者欢，游山玩水最风光；有朝一日回家转，
带回墨鱼和笋干。”所谓墨鱼和笋干，泛指土特产，当年虽不兴送礼，但记者借下乡之便，就地买一些便宜货带回家，在物资匮乏的年代，倒也是令人羡慕的一件事。但不知今天新闻队伍中的一些不正之风，是否也滥觞于此？

为了培养新秀，壮大通讯员队伍，县报道组还自编讲义，办起了好几期通讯员培训班，并在下乡采访中集体实习。学员中的佼佼者，后来都成为国家的有用之才，如黄荣业、黄德豪，如今分别为厦门市和漳州市的处级领导，女学员中的王少卿，当年还是个天真浪漫的小姑娘，如今已成为县里的“活字典”，当上了方志委的主任。我们的办班成果，甚至还惊动了厦门大学，该校新闻系创办伊始，就把学生带来南靖实习，并聘请我讲课。这也是我在下放期间，惟一一次重操旧业，为大学生们上写作课。

编外秘书

其实，报道组的任务，不光是写写新闻报道方面的稿件。为县里领导起草文件、报告、讲话稿，这才是一切工作

的重中之重。当年，县里的建制不像现在这样，五套班子齐全，每套班子都有办公室，每个领导都有专职秘书，笔杆子比比皆是。当年，县里只有一个办公室，几把笔杆子，全县所有上报下传的文字材料，全都在这里制作、打印、发送，好比一个小小的针孔，要让千百条线都从中穿过去。其文字工作数量之多，要求之高，时间之紧迫，劳动强度之大，可想而知。每逢中心运动、大型会议，办公室人手不够，自然要抽调报道组人员参战。如我，每年被抽调的时间大都在半年以上。尽管当时，我还只是个党外人士，又是个被临时借调的“下放干部”，但为了更好地领会领导精神，居然还不时被邀请列席县委常委会呢！不过，由此所带来的开夜车，熬通宵等苦差事，自然也就成为我的日常功课了。

说起来，这些公文——在文章分类学上当属于高级应用文吧？其种种写作方法，过去我在大学讲台上也都涉猎过，但如今实践起来，却往往与理论相距甚远，出现了许多在讲义中，在课堂上从未遇见的问题。

比如，理论上要求所有的材料必须抓住重点，切忌面面俱到，但县里的材料，尤其是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，却只有面面俱到，才能过关。每个领导分管的工作，每条战线的工作，每个部门的工作，你都不能有所疏漏，有所闪失。有关领导班子自身建设的上报材料，更不敢掉以轻心，每个领导都必须安排与其相关的正面典型事例，县必须按其职务高低，安排适当的位置，提供恰当的篇幅。哪怕是叨陪末座的领导，你都不敢有所省略，说不定两年之后，他就是班子的第一把手，要是你现在冷落了他，日后他要给你小鞋穿穿，还不是易如反掌的小事一桩！

又比如，理论上说，公文写作，必须采用规范的书面语言，力求科学、准确，一般来说，应尽量避免过于个性化的带感情色彩的语句，这在当年，动辄因出言不慎而招祸的政治背景下，尤为重要。但实践起来，却只能因人而异而千变万化。特别是给领导写讲话稿，务必要摸准他的脾气，了解他的好恶，熟悉他包括口头禅在内的一切语言习惯。有的领导理论水平较高，于是，引经据典、纲举目张，条分缕析、综合归纳、至关重要。其大小论点，每一句还都必须有所来历，有所根据，以防日后形势发生变化，追究起来，什么事都没有。有的领导来自基层，讲究实际，其本人文化水平又不高，他的讲稿则务必口语化，务必要有生动的事例，最好还能有数字化的归纳和概括，即一、二、三、四等序列数字，加上搞、闹、抓、干等当年最流行也最省事的万能动词。如此这般，言者朗朗上口，听者好记，也好传达，简明扼要，皆大欢喜。还有个别领导特别喜欢群众口语，于是，每个典型事例之后，都要补上一段顺口溜，名曰“群众深有体会地说”。其实，这些顺口溜大都是秀才们闭门造车胡凑出来的，其所押的韵脚，往往也都是北方话中的“子”“儿”“头”之类，如：“干部要带头，群众尝甜头，农村有奔头”等等，放置四海而皆准，并非闽南特有的方言，但因领导者本身是北方人，只要念起来顺口，这讲稿也就一路绿灯顺利过关了。

说到材料送审，这里头又大有学问。刚开始时，我自视甚高，以快取胜，一写完就立马送审。这下子可吓坏了身边那些老秀才，他们纷纷出来拉后腿，好心好意告诉我稍安勿躁。后来，我终于明白，秀才们的潜规则，是“三不送”：

一，材料刚写完不送。因为你材料写得再好，只要还有时间，领导总要你反复修改，还不如趁此机会赶紧补睡个大觉。到时，材料马上要用，不论好坏，全都过关了。二，上半夜不送。因为领导大都在临睡前看材料，深更半夜，一个电话下来，指令你如何补充，如何修改，你就非得熬通宵不可了。三，领导心情不好时千万不能送。否则，你和你所写的材料，只能代人受过，惹火烧身，让他当出气筒，让他横挑鼻子竖挑眼，骂得你狗血喷头，晕头转向，戴着眼镜到处找眼镜去！

感谢当年那些同甘共苦的战友们，包括办公室主任陈印昌，包括老秀才关为国、吴阿木、吴荣寿、以及后起之秀陈其川、尤宗祥、魏江水等，他们不但教我如何写公文，还教我如何做人。只是今天回想起来，总觉得彼此都十分可怜、可笑而又可悲，尽管伟大领袖《反对党八股》反了多少年，但“文山会海”却愈演愈烈，发展到“文革八股”，则更是登峰造极地“流毒全党”，“祸国殃民”了。当年，我们这些在基层耍笔杆子的秀才，既是“文革八股”的批量克隆者，也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，个个“为伊消得人憔悴”，脸黄肌瘦，形销骨立，眼眶上都有一圈因长期睡眠不足而留下的暗影。有一次，县里召开学习领袖著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，我连着熬了五六个通宵，最后，上腹部剧痛如刀绞，连大便都变黑了，医生说是胃出血，我这才打针吃药，卧床休息。好在那时年轻，过了三天，又重新披挂上阵。

当然，对付这种八股文，久而久之，我们也找到了一些偷懒的办法。比如，一份大材料的写作任务布置下来后，我们不再每人分工写一部分，而后再集体拼凑成文，待初稿出

来后，又经过三番五次的增删修改，这才誊清、抄正为送审稿。那样，费时甚多，功效甚少，既吃力又不讨好。我们大胆发明“一次性流水作业”的集体泡制法，即先讨论出一个大纲后，由思维敏捷的秀才甲躺在床上打腹稿，对文件中的务虚部分，一句句进行口述。擅长硬笔书法的秀才乙，则正襟危坐，边听，边推敲，再工工整整地把它抄录到稿纸之上。至于文稿中写实的部分，如所需有关数字，则留下空行；所需典型事例，则留下空页，由秀才丙、秀才丁另室专门打电话、查资料，写成专行、专段后，再送到秀才乙处加以填充。此时，若还有秀才戊加盟，则负责校对、打印、装订及端茶、递烟等后勤杂务，最好还能插科打诨，不时说些民间笑话之类以活跃气氛，减轻疲劳。如此分工合作，一稿而成，比每人分头闭门造车，面壁苦思，孤零零单干好多了，可谓事半功倍，何乐而不为呢！

也许，在今天的秘书们看起来，这只不过是有点可笑的雕虫小技罢了，但在当年，一切书写全凭手工，一句话写错，重抄一遍就是一张三百字的稿纸，哪像今天，坐在电脑前面，敲敲键盘，点点鼠标，剪切、复制、粘贴、下载、打印、发送，都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功夫呢！

当然，有时也不得不孤军奋战。比如，我曾奉命为县领导起草一篇特殊的讲话稿，一篇在任何写作讲义上都没有出现过的文体——“假检讨”。时值所谓“反击右倾翻案风”的非常时期，县里的“造反派”“勒令”县委书记明天要在大会上作“触及灵魂”的“深刻检查”。半夜，他亲自扣门来访，一脸无奈的恳求：“无论如何，天亮之前，你得给我弄出个讲稿来。注意：一要长，能讲满三个钟头，以免剩下

时间让人围攻；二，帽子尽管扣，但千万不能联系具体事例，更不能牵涉到任何人。”于是，我不得不诚惶诚恐，挑灯夜战，广征博引，叠床架屋，抄录了无数条领袖语录，摘引了无数段中央“两报一刊”社论，为主讲人开列了一条条有名无实的罪状，戴起了一顶顶看起来吓人，实则一戳就破的纸糊高帽，直到东方既白，雄鸡报晓，我瘫倒在案前，再也直不起腰来。

呜呼，“假检讨”！只有在荒唐的岁月里，才能有如此荒唐的文件！

而我的青春岁月，大好年华，也就在这“编外秘书”大量辛苦、无效乃至荒唐的劳作中，在过眼云烟的文字垃圾堆里，白白地流逝了。

生儿育女

当年，在青年知识分子中，流传着这么一句话：“不成名，便成家。”即大学不办了，科研机构撤消了，文艺团体解散了，“臭老九”们“读书无用”，前程未卜，与其虚度年华，不如趁早结婚，生儿育女去吧！

文学梦早已破灭的我，自然不能免俗。小家庭在山城安顿之后，发现屋后有片荒芜的斜土坡，妻子信手种下一株香蕉。没想到，到了夏天，它就结出一大串沉甸甸的果实来，摘下一称，足足有30多斤重！我俩由此大受启发：何不响应领袖号召，学习南泥湾精神，也来个“自力更生，丰衣足食”！于是，利用早晚时间，抡起内山带来的大山锄，破土平整土地，垒石砌就护岸，终于在荒土坡上开垦出两畦窄长